

目錄

序言 1

主題文章：

From Master to Marginal in Post-Socialist China:
The Once-Proletariat as New Excluded Entrepreneur
..... Dorothy J. SOLINGER 1

第一部份：國家與管治

發展中的「他／她者」：中國農村社會邊緣性的形成... 古學斌 15
社區公共服務社：消除邊緣性的社會政策研究與應用
..... 楊國、葛道順 35

Policy Traps and Injured Identities:

The Making of Social Disadvantages in “The Other” Tsuen Wan
..... Hon-chu LEUNG and Rachel Hiu-kam WONG 49

Promises and Disappointments on the Social Inclusiveness:

The Socio-Politics of the Contractual State in a Volatile Market Place
..... On-kwok LAI 61

第二部份：工作、就業與城市貧困

經濟排斥與社會邊緣：

廣州市社區企業就業女工的經驗調查 劉繼同 85

制度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排斥和邊緣化：

以中國大陸的下崗職工為例 孫炳耀 99

社會排斥與城市貧困群體的生存狀態 唐 鈞 113

華人社會中的社會排斥與邊緣性

主 編：古學斌、李明璠

出 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政策研究中心

版 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政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962-7104-57-4

Social Exclusion and Marginality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ors: Hok-bun KU; Ming-kwan LEE

Published by: 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opyright: © 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ate of first publish: November 2003

ISBN: 962-7104-57-4

發展中的「他／她者」：中國農民社會邊緣性的形成

古學斌

引言

農民沒有寫她／他們自己的歷史，也沒有專門為她／他們所寫的歷史……在那決定政策和利潤的場域通常很少聽到她／他們的聲音。那些非農民者往往以自己的利益和意念，用經濟和政治的計劃安排來決定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法，而這些方法深深地影響著現代農民的生存 (Shanin 1987 : 381 ; 筆者的翻譯)。

Teodor Shanin所描述的是「農民群體」在近代社會的處境。這個群體和他們的子孫是全世界的大多數，即使在當代發達工業化國家，仍構成人口的多數。然而像Shanin所描述，他們是多麼的無權勢、多麼的被動和失聲。「農民」作為一個社會類別 (social type)，有兩重含義：一是指那些從事農業活動的人群；二是指一種身份 (identity)，作為一種身份可以是被官方透過法律界定的，也可以是文化建構的，但眼是否從事農業活動不一定有關。

根據2000年中國大陸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字，2000年被界定為農民人口的有80,739萬人，仍佔總人口的63.9%。農村經濟佔國民經濟比重從1980年的32.7%，上升到1998年的53.1%，而糧食總產量達到49,000萬噸。農民除了養活自己之外，還養活了城市的45,594萬人口。

佔人口的大多數並沒有為這社會群體帶來多少優越感，養活別人也不能為他／她們掙來多少的尊重。我從1995年開始從事中國大陸農村研究，接觸過不少的農民，他／她們給我一種總體印象是他／她們總是瞧不起自己，當然更多的是別人瞧不起他／她們。「被瞧不起」是別人在作用，別人所持的通常是一套含有「偏見」和「歧視」的標準；「瞧不起自己」是自己在作用，自我接受一套別人對自己負面的看法和觀念。然而，為何在一個聲稱「以農立國」的國度裏，農民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總是被瞧不起呢？為何佔人口多數的群體卻成為社會的邊緣呢？這文章借用福柯 (Michel Foucault) 對知識、真理和權力的分析來理解中國農民社會邊緣性形成的過程和原因。

本論文主要分為四部份：第一嘗試描述農民和農民社會在學術領域的概括圖像；第二部份借用福柯的概念來理解農民的「他／她者」形象如何在發展論述中被建構出來以及背後的原因；第三部份將從中國的例子來揭示發展主義的論述和意識形態如何邊緣化中國農民和農民社會；第四部份將討論中國農民邊緣身份形成的結果。

農民社會的邊緣圖像(Marginal Image of Peasant Society)

他們是一群沒有聲音的人，雖然他們佔了中國人口的五分之四。他們……受到了地主的壓榨，政府的課稅。若能躲過飢荒和洪水之害，才能生存下來。他們只能在饑荒和和禍患中乞求憐憫(Buck轉引自Huang 1994: 2; 筆者的翻譯)。

一直以來農民被建構成無權勢者和失聲的群體(Marx 1987; Gorky 1987; Fanon 1987)。在學術或者一般的論述中，不管是中國農民還是其它地區的農民，都被看成是被動的群體，他們沒有自己的歷史，只是被動地接受別人所賦予他們的要求和意識形態。他們沒有能力爭取自己的階級利益，也沒有能力為自己說話。他們沒有能力主宰自己，故他們永遠活在別人的憐憫當中(Shanin 1987; Buck轉引自Huang 1994)。

古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農民的無權力是基於經濟的因素。對於馬克思來說，以農戶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限制了農民的社會活動，他在評論法國農民時講到：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或存有地域的聯繫，亦由於他們利用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馬克思，1972：693)。

馬克思的「馬鈴薯比喻」告訴我們兩件事。第一是農民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即是說他們必須被別人所代表；第二是農民雖然佔了人口的大多數，但由於小農生產方式的限制，使他們無法發動起來成為革命的力量。小農經濟模式使他們之間互相隔絕，缺乏交往，就像「麻袋裏的馬鈴薯」一般沒有聯合的意識。故革命只能靠工人階級，因為隨著大規模生產的開始，工人們在大工廠中共同工作，突破了像農民那般孤立的隔絕狀態，培養了他們集體的階級意識，最後他們將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Marx 1972)。

馬克思對農民革命潛能的描述和對工人革命勝利的預測是基於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框架，而這歷史唯物主義基本上是受現代主義哲學觀的影響。與現代化理論一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也是以一種直線式的邏輯來看社會發展，認為社會必然從一種簡單的、停滯的、乏生產力的(unproductive)、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進化到高科技的、高生產力的、文明的、先進的現代工業社會。從經濟的意義上，傳統小農經濟將從小規模的、自給自足的模式轉變到大規模的、市場主導的經濟。農民或農民經濟被描述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被動的受害者，或者是歷史發展當中前工業社會的殘餘(Scott 1985 & 1989; Giddens 1987; Collins 1994)。這種現代主義的歷史觀同樣指導著中共建國以後的發展方向或策略以及影響著治國者對農村社會的看法和經濟政策(後面會詳細討論)。

雖然在二次大戰之後到六、七十年代之間，農民運動(包括中共的農民運動)的成功曾為農民爭得一段爛熳輝煌的時期(Adas 1992)，但卻無法為農民社會洗脫被人建構的貧困落後、不文明的封建殘餘的形象。中國大陸在建國以來的主流發展論述，就時常透露出這種對農民社會的看法。論述作為知識建構過程的一部份如何與權力互相勾結而生產出農民社會的邊緣性，下面部份將進一步討論。

他／她者建構和權力宰制 (Power Dom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Others)

一 知識、真理和權力的操作(Knowledge, Truth and Power)

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講，任何一個社會類別都不是先驗地存在，

是被建構出來的，而這建構也不是一個自然天真、毫無動機的建構，而是為權力服務的。

福柯放棄了傳統對權力的理解，認為權力的體現不再是統御階級相對被統御階級，或者國家相對社會(人民)的二元對立，也不是層級式的(hierarchical)從上而下。對他來講，權力是無處不在的，「有權力存在的任何地方，它都在運作著。」福柯特別關注的是權力與知識(knowledge)之間的關係，那就是權力透過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形塑人們對世界的理解(主體性/subjectivity)，使人們接受主流社會的意識和價值，接受現時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安排。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人們自願接受某種特定的思考和行動模式，不單自我要求改造，馴服於規訓，更加主動要求社會上的其他各人也同樣思考 and 行動(Foucault 1980; 1981; 1988)。

福柯用論述(discourse)的概念來審視權力/知識在日常生活的微細操作的過程。他認為權力的運作最主要是透過建立一種「統治真理的羅網」(regime of truth)去規訓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按照Rabinow(1984)的閱讀，「統治真理的羅網」的建立主要有三個關鍵的踐行：分層的踐行(dividing practices)；科學的分類(scific classification)和主體化過程(subjectification)。

「分層的實踐」是透過分隔自己和他人而將主體客體化，結合科學的分類，其目的是為了排斥他者。「科學分類」通常是假借科學和專業之名將分類合理化，為的是要定義出正確與不正確的思想、正常與不正常的行為等各種分類，從而對那些被定義為「不正確」與「不正常」的思想和行為進行監控規訓。監控規訓的手段通常是獎勵和懲罰，使得社會變成一個規訓的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在這過程中，科學和知識成為分類的理據使權力的操作合情合理，這正是為甚麼福柯講「權力生產知識，權力和知識互為作用」。沒有一種權力不需要建立知識的領域，相反亦然。「主體化過程」或形塑自己的技術(technology of self)是福柯最關心的過程，那就是人們如何將自己轉化成主體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主體是主動的，個人透過自己的方式去操控和形塑自己的身體、靈魂、思想和行為，也就是去轉化自己，調整自己使達到一種完美快樂的境界。統治和管理的藝術(伎倆)就是要使個人自願地去軌調(regulate)自己以迎合統治者或主流社會的統御和要求。

除了福柯之外，眾多當代學者皆有力地論證，論述的生產和流通是權力運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發展本身作為一套論述，精彩地扮

演了這角色(例如Frow 1985; Said 1979; Hobart 1993; Escobar 1998)。

二 發展主義論述中的他／她者 (Others in Developmental Discourse)

借助福柯對知識、真理和權力的分析，一些學者(例如A. Escobar 和T. Banuri等)嘗試追溯發展主義論述的歷史系譜(genealogy)，解拆西方世界如何透過建構發展主義的論述來建立西方與其他非西方世界的權力關係，確定自己在世界體系中的優勢。他們再不把發展議題看成只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Escobar 1995; Ludden 1992)。

Arturo Escobar(1998)認為發展主義的論述自戰後這幾年出現和形成，其建構背後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擴張以及共產主義的冒升有密切的關係。在這種歷史的語境下，全世界被二元劃分成為「發達」與「不發達」、「發展」與「不發展」等類別。把西方以外的所謂貧窮地區命名為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發展中地區、低度發展地區、邊陲地區等；其實為的是界定自身的優越地位，像英國人類學者Marx Hobart(1993)所言：「沒有把第三世界國家說成不發達和無知，西方將不能代表自己是發達和進步的知識。」

當然這種建構的過程是複雜多變的，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過程：首先西方把自己本身變成是主體(Subject)，自我客觀化地研究本身社會歷史演進過程，把它變成一種近乎是科學客觀的知識(現代化理論是其中的表表者)。於是，發展(或發展研究)成為一種專業，紛紛出現在歐美各主要大學和國際機構，為生產關於第三世界的真理和規範化知識啟動了強有力的機制。各大學和機構負責訓練發展來自「第一世界」的專業人才，更為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提供各種建基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真理」(詳見Escobar 1998: 428-43; Banuri 1990:249-78)。

接著是標籤生產的過程，發展專業人士用一套建立起來的「客觀」知識/真理去研究和衡量其他的非西方社會，對各種社會進行分類，為西方和非西方社會畫出一條界限，把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分開，現代和傳統社會分開。西方社會被描繪成一種文明、民主、高效率和高生產力的社會。相反第三世界社會(大部份是農民社會)卻變成一種野蠻、不開化、貧窮、生產力低的傳統社會；各種紛雜多樣的農民也

被化約為「小農」、「文盲農民」等。另外，西方社會的發展路程變成了唯一「正常的標準」(Normality of Change)，凡不合乎標準的(abnormal)社會都被貼上傳統社會、未開發社會的標籤。故要踏上富強或現代化的道路就必須以西方工業文明為目標，採納與西方發達國家相近的知識系統和技術，發展科技、發展工業、建立市場經濟等。

基本上這一套發展的知識把現代化等同於經濟發展，以西方的工業大國的財富和權勢為模範。在這種經濟發展的邏輯底下，追求利潤成了最高的目標，要達至這個目標，就必須應用科技，提高生產力，更好地運用資源(換言之更好地駕馭大自然)；另外，又必需發展龐大的機械化和有效的管理方式，才能「盡量利用」勞動。在這時候，窮國的人口、資本積累、天然資源、農業和貿易、行政管理以及文化價值，都變成了無休止的規劃干預物件(object of intervention)；而當地的民眾(小農)也變成傳統社會的殘餘，可被替換和應該被管理、被發展、被現代化、被教育和規劃的物件。

發展主義的論述要得以落實，更重要的一環是西方必需讓這一套「發展」的論述成為霸權統緒(hegemony)，使第三世界社會也接受別人加給自己的標籤——覺得自己是落後的、是需要給開發和發展的。當然這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有的先以軍事侵略而有的卻以經濟侵略為先²，更加隱性的是透過體制性領域的建立，使充滿現代化偏見的論述，大規模地引入「第三世界」，強化了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像 Escobar 所言：

……各式關於發展的論述和技術，都在這個體制性領域內，或由這個領域生產、記錄、確立、改良以及投入運作。帶來這些效果的發展體制網路包括國際組織、雙邊機構、志願組織、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全國性、地區性和城鄉性組織。這些機構通過應用計劃、會議、專家小組、顧問意見等，利用關於發展的知識。通過利用特定模式的知識和產生特定的介入方式，這些機構構成一個網路，組織能夠被看見的以及不能被被看見的事物，讓權力運作變得可能(Escobar 1998：428-43)。

總之，在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綜合複雜過程底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也認為自己是需要給開發的，需要超越英趕美，並積極付諸行動參與到發展的計劃裏頭。

三 被編造發明的中國農民和農民社會 (Invented Chinese Peasant and Peasant Society)

像上面所述，「農民」作為一個社會類別，並非只是指一個從事農業活動的實在的社會群體，它同時是一種文化身份，而這種身份是在特定的歷史語境底下(historical context)被編造發明的。說它被發明編造並非是說農民這社會類別以前不存在，而是說「農民」作為一種市民身份是在當代中國才出現的，這種身份類別隱含著特殊的政治意義。這過程並非是單單的法律界定，而是一個文化建構過程，除了配合現代國家行政管理的方便外，還是為了國家政權服務。

(一) 等待救贖的他／他者 (Others Waiting for Salvation)

Myron L. Cohen(1993)在〈現代中國的文化和政治發明：中國「農民」的案例〉一文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農民這種社會類別的編造發明是配合著中共政權建立初期的政治論述而出現的。

每一個政權的建立都需要為自己的認受性提供理論的依據，中共也一樣，建國初期也需要合理化自己的執政。在官方的政治論述中，「新中國」和「舊中國」是基本的論述框架。「新」有多層面的意義，指涉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新中國」象徵了在共產黨領導下光明的社會，而共產黨代表著進步的力量；「新中國」代表了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的新社會；新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一個公平的制度；新中國的社會關係是一種平等的關係；新中國的道德情操是一種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新中國」的建構必須同時建構另外一個「舊中國」，一個需要被否定的社會形態。在官方的論述中，「舊中國」、「舊社會」是一個黑暗的社會，充滿著社會不平等；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勞苦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受盡剝削；在舊社會受盡苦難的老百姓(主要由農民組成)需要被救贖，等待著大救星的救贖，而這救星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眾多文章中都重覆了以下要點：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

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成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成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毛澤東 1991）。

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 1991）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毛澤東 1991）

這是一套統治真理的羅網，透過對舊中國的建構以合理化新中國的出現，像Cohen就這樣說：

……舊社會的特徵必需有足夠壓力的資料來加以描繪，使得它的形象能夠形成一個有高級的負面圖像，注入民眾的意識和文化的外表之中。同時，對新社會的肯定必需由文化的編造發明支撐著，使它能够堅固和正面地被民眾所接受（Cohen 1993：152；筆者的翻譯）。

「舊社會」和「新社會」的論述框架背後是一種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其支撐著國家的政治論述。既然「舊社會」是那麼的不可取，「新社會」的出現就顯得那麼理所當然。這是權力操作的策略的一部份，將農民和農民社會塑造成落後、愚昧、無助的形象很好地合法化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也解說了國家一直以來所推行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在官方的論述當中，農民社會被描述成舊中國的代表，傳統農村社會的東西包括：生產方式（小農經濟）、權力結構（知識階層、士紳階層）、傳統文化中的宗族系統、祖先崇拜、和民間宗教等都重新被定義為封建主義，是國家發展的阻礙，是必需被否定和消除的。

經濟方面，在官方的論述中，傳統的農業經濟是非常落後的，農民的生活也非常困苦。在一部《中國農業經濟發展五十年》的電子書籍中，就是這樣描述解放以前的經濟狀況：

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重重壓迫和剝削，舊中國農業生產發展極為緩慢，生產水平十分落後，不僅落後於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也落後於清朝中葉。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以後，中國的農業生產遭受了更加嚴重的破壞，廣大農村田園荒廢，廣大勞動人民饑寒交迫。

小農經濟一直被指責為中國社會落後的根源、也是經濟發展的阻礙，故需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被改造，於是，一場規模前所未見的大型社會規劃工程在毛澤東時期不斷展開。其間近幾十年來發展政策雖然以不同的面目包裝，但其發展論述的基調是複製了發展主義（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相信社會發展必需從傳統到現代、從封建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直線發展。儘管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把土地分配給數百萬原先的雇農和貧農，但這不是政府的最終目標，那只是為了打擊農村舊勢力和鞏固農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支持。土改分田在政府的眼中依然保留了解放前農民社會最突出的特徵——私人所有制和小農生產制度，這種代表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是不能長期存在的。故很快政府以國家規劃的模式直接介入農村社會經濟模式的改造——集體合作經濟的開始。

雖然社會主義中國在經濟發展的手段上（國家計劃）與西方國家不同，但背後的發展目標卻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將中國推向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故毛澤東時期的發展一樣以西方的工業文明為標準，強調要超英趕美，強調工業和城市發展。在強制性工業化的過程中，政府把投資重點放在工業方面。根據Nicholas R. Lardy所言：「中國政府在農業投資上（不計農民個人投資）相當有限，儘管農業直接創造一半以上的國民收入，擁有的勞動力佔總數的4/5以上，但農業投資不到總投資的8%。一半以上的投資用於工業，其中近90%用於生產資料生產部，如冶金、機器製造、電力、煤炭、石油和化工，少量的工業投資（30%左右）被用於擴大農用機械和化肥的生產」（Lardy 1987：144-80；筆者的翻譯）。合作經濟的形成和統購統銷等制度的確立更加體現國家重工業的做法，使國家更能夠從農村獲取資源（特別是糧食）以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以及取得工業化發展必需的原材料（Mueggler 1991；Cheng & Selden 1994；Schurmann 1968）。

鄧小平時代同樣需要建構一套發展的真理以合理化政府的改革開放。官方的論述一方面將毛澤東時期的貧窮、落後和經濟發展的失敗

和停滯歸咎於毛澤東時期國家政策的失誤(特別是林彪和四人幫的禍害);另一方面亦歸咎於農民低落的教育水平和自私自利的小農意識。農民再次成為國家政策失敗的根源。要改變農民社會落後的面貌,他們需要新的農業政策,需要改革開放。

改革時期雖然不再是合作集體經濟,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而背後依然是一套現代化發展的論述框架,私有化、市場化和商品化是新時代的統治真理,歷史的發展依然是一種直線式的道路。中國政府在1982年的十二大通過的工作報告中就明確地指出:

總起來說,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逐步擺脫貧窮、擺脫落後的階段;是由農業人口佔多數的手工勞動基礎的農業國,逐步變成為非農業人口佔多數的現代化的工業國的階段;是由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佔很大比重,變為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階段;是通過改革和探索,建立和發展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階段;是全民奮起,艱苦創業,實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

故改革開放時期,國家積極發展鄉鎮企業、引進外國的資本以發展工業、另外又大力發展商品農業,盼望早日達到高度工業化和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階段。

發展主義的論述除了經濟方面外,還有其他的內容。譬如在宗教方面,傳統文化也被視為是舊社會的、封建落後的東西。像Cohen(1993)所言,許多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知識份子對農民社會的民眾文化(popular culture)特別是宗教非常有敵意,他們都支持政府推毀這些代表著社會文化的廟宇神台,透過把農村社會納入創新的國家文化框架中去重建農村社會。Duara(1995)在他的《從國家的手中搶救歷史》一書中也舉了很多的例子說明新中國知識份子對傳統民間宗教的敵視,把一切傳統宗教都視為迷信和落後,他們非常迫切希望與過去斷絕關係,用Duara的語言是「歷史的終結」(end of history)。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的《解放日報》中就有這樣的論述:

我們已經看到了新社會的美麗與光明,但也看到了部份的醜惡和黑暗,這些醜惡和黑暗是從舊社會中,舊的思想意識中帶過來的滲透,它附著在新的社會上而且腐蝕著新的社會。我們就必須指出它們,埋葬它們。

除了宗教,舊社會的社會關係也必需被改變。作為傳統道德基礎的家族和宗族關係在官方的論述中也是充滿壓迫性的,故需要被改造成一種普世的道德倫理關係,那就是官方發明的「同志」(comradeship)。同志意涵了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其中基本上是否定個人、強調集體。作為構成舊社會階級關係的經濟制度同樣是被否定和消滅的重要部份,一九四九年中共當政以來,迅速地推行土改運動,為的就是重新定義階級關係;進一步的合作化運動也同樣是為了建構一個新的社會關係,傳統的社會關係例如:家庭、夫妻、朋友、男女等私人關係網都要被打破,在集體生產中,大家都變成了同志的關係(Vogel 1965; Yan 1996; Yang 1994)。

生活在村落的農民雖然是無可指責的可憐的受害者,但他們卻承載了封建文化的傳統,像陳獨秀所講的「任何民族中封建社會時代的農民,他們的思想都不免有頑舊迷信的色彩」,所以也需要被改造。故官方的論述和愛國學者的文章小說中,農民不斷被塑造成一個政治的他／她者——一個被動、無助、未啟蒙、迷信、無知、死氣沉沉、了無生趣的群體。因此,他／她需要被教育改造和文化更新,靠的是國家領袖的拯救和那些理性有知識的外來者(知識份子)介入。

(二) 制度性排斥的戶口制度 (Hukou System as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中國農民的邊緣性除了被一套發展主義的論述所構成之外,幾十年來各種各樣的政策和制度也不斷地將他們推向不利的位置,強化了中國農民的邊緣性。戶口制度一直被批評為對中國農民最不公平的制度之一,是中國城鄉二元分化的根源。

戶口制度並非中共先創,戶籍管理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主要功能只是為政府徵稅提供了統計依據。但新中國的戶籍制度卻為人們提供一種身份的識別,這身份附帶了新的社會政治含義,也為國家提供一個有效但卻不太公平的控制工具。

新中國的戶口登記制度是在1953年為準備普選而進行的第一次全國人口調查登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1956年6月國務院公佈《關於建立戶口制度的指示》,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戶口登記制度,並規定了居民遷居時必需履行的行政手續。1958年1月國家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開始實行一種極其嚴格的戶籍制度。戶口登記是以戶為單位,記錄了戶中成員的資料,以及註明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家長的地位。按照《全國人口調查登記辦法》規定:「人口調查登

記以戶口為單位：一、凡家庭成員在一起住宿者，作為一戶；二、獨身居住者，作為一戶；三、凡居住在機關、團體、學校、工廠、教養院、收容所、寺院、教堂、船舶等單位內之人口，各以其單位作為一戶。但上述各單位所屬的分支機構和在外的宿舍以及在上述單位內居住的家庭，均應分別立戶。1958年的戶口登記條例公佈後，政府發給每戶居民一本「戶口名簿」，並規定戶口名簿所登記的內容具有證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當然這制度的有效執行依靠軍隊和警察力量的支撐。

問題是戶籍對於大陸人民來講並非是統一的，而是存在著兩種戶籍的種類——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這戶籍制度與票證制度掛鉤，為城市和農村戶口提供了不同的物質內涵，產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城鄉差距。

國家對全國非農業(城市)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並發給供應憑證的供應制度，居民供應憑證分為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證、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全國通用糧票和地方糧票。在實際過程中，對居民發放這些糧食供應的憑證就是戶口登記。戶籍制度除了與糧食制度配合之外，還與不同制度配合，例如：副食品燃料供應、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因此也成為國家控制國民的手段。農村的民眾並沒有這些配給和福利。具有農村戶口的居民在農業合作化以後由生產隊按當年收穫和向國家交售的情況分配口糧。兩類戶口的最大分別就是具不同戶口登記的居民按不同的渠道和數量獲得必需品，這樣形成了新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的局面。在五十年代之後，城鄉之間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在一九八三年，估計城鄉之間收入的比例是2.2:1。但有些學者像Rawski計算出如果排除補貼，城鄉之間收入的比例應該是3.4:1；如果把城市居民的補貼也算進去，比例會擴大到5.9:1(Rawski 1972: 12-26)。

雖說由於物質的缺乏，戶口制度為國家基本必需品的統購統銷提供了最可靠的控制手段，但戶口制度亦是國家保障城市居民利益的手段。像上面所說的，這種做法與中共在建國以後的發展意識形態有關。當時政府受蘇聯發展模式的影響，強調發展城市和工業。無論是專家還是領導人相信要現代化就必需發展重工業，在資本薄弱的國情下，國家利用行政手段抽取農村的資源以補助城市，結果犧牲了農民的利益。

戶口制度還成為控制人口流動(主要是從農村流向城市)的重要手段

段，1958年的戶口登記條例規定：戶口登記工作由各級公安機關執行，而且「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證明」，然後才能在當地戶口管理機關辦理遷出手續。建國以後國家多次利用行政的手段控制城市的人口，農村變成了接收城市多餘人口的地方，同時亦為城市提供勞動動力。例如在五十年代後期大躍進失敗後，中共政府就有效利用戶口制度控制了城市的人口。大躍進期間，由於國家在城市迅速發展工業和建立工廠，當時國家為農村民眾大開向城市流動之門，使很多農民因招工之名進入城市成為臨時工，1958年秋天，估計有三千八百萬的農村人口離開了自己村莊(Cheng & Seiden 1994: 665)。但他們並未因此改變自己農民的身份，隨著大躍進的失敗，國家通過戶籍制度用強制的行政手段把他們遣送回農村。很明顯，農民只是剩餘勞動動力，當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他們仍被扔回農村。

今天在改革開放的熱潮下，農民再度成為了新工業開發區的勞動動力，被吸收到工廠裏為老闆打工，社會上給予他們一個新的身份標籤，叫「農民工」。這裏無意要詳細描述農民工的勞動生涯，想指出的是「農民工」這種亦工亦農身份的出現，意味著戶籍制度時至今日仍然發生作用。農民工雖然改變了勞動的性質，從事工業的生產活動，但戶口的限制使他們無法改變自己農民的身份。他們在城市裏沒有長久居住的權力，在失掉他們工作的時候，他們隨時變成城市的流浪人口，在每年嚴打高潮時，都要被遣送回鄉。雖然現在戶口制度比毛澤東時期相對放鬆，農民可以透過不同的手段(譬如用錢購買戶口等)轉變自己的身份成為城市人，但對於大部份的農民來講，這個始終是一個難圓的夢。

四 自我認同/否定的邊緣身份 (A Self-Accepted/Denied Marginal Identity)

不發展是一種身份，它告訴人們一些關於自己的意識。今天人們思想他們自己是誰，應該如何過活，和應該做甚麼來改變自己的生活等都已深深地被制度、意識形態和發展的幾行所形塑(Gupta 1998: ix; 筆者的翻譯)。

發展主義論述和國家制度的挽手配合，為中國農民生產了一個邊緣的身份——無知、貧窮、落後、愚昧、不文明和傳統。這個別人賦

予的身份，今天已經不斷地影響著中國農民社會前面發展的道路；在個人層面，不斷地形塑著農民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社會和文化。筆者在農村與農民日常生活的對話中就不斷聽到這種聲音。像：

我們甚麼都不懂，沒有文化水平。

農村落後啊，沒有甚麼好的。

農民是最低等的，誰都看不起我們。你知道城裏人怎樣看我們嗎？他們說農民一腳牛糞。

幹農活就是沒出息，一輩子拔窮。

呆在村裏沒出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出去的都出去，多讀點書，出人頭地。

長期以來，中國農民因為國家政策上的歧視，經濟上一直處於不利的位置，貧窮是他們真實的生活經驗。這種實在的經驗使他們在心理上也產生了一種社會缺乏(social lack)，這種缺乏使他們產生一種強烈的慾望，那就是希望能夠離開農村，脫離自己農民的身份。根據Lei Guang整理的數字，農村流動人口從80年代早期的大約兩百萬上升到1994年的七千一百萬，他並且估計這些農民流動到城市的人口還會繼續上昇(Guang 2001)。

到外打工，不是每個人都能賺到錢，也不是每個人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筆者與有外出打工經驗的農民交談中發現，其實很多人都有不愉快的經驗：被城裏人歧視、被老闆欺負、被同鄉欺騙等，但依然有很多農民希望能夠外出打工。當然有的農民實在是因為村裡經濟困難而呆不下去，需要到外打工幫補家計。

筆者在廣東富裕的農村做調查時發現，對於農民來講，不是物質生活改善了，他們就能夠接受自己農民的身份，願意留在村裏。以下就是一段筆者與一位年輕農民的對話：

信：學斌哥，這次你回來覺得我們村子有甚麼變化？

學斌：我看到你們種了很多的果樹，不是嗎？

信：是的，每家每戶都種了很多的果樹，我也種了兩百棵。沒

法，在農村我們只好依靠這點過活。

學斌：不錯啊，兩百棵樹每年可賺不少的錢。

信：可不是，我現在只有八十棵有掛果。其他的還要等三到五年。這是我的事業。我投入了很多錢。如果市場好，我會集中種果樹。我有很多的計劃，為我榮建一個新房子，為他討一個老婆，還想買一輛摩托車……

學斌：我看村裏的生活可不錯。你的工資不會比普通工人低啊。

信：我不完全同意你。雖然我們現在跟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拉近，但農村始終是農村，還是有差距。農村還是沒有甚麼可發展的，只有果樹。現在我的打算是儘量多賺錢，我打算把我的兒子送到城市去接受教育，叫他不要回來了。呆在村裏沒出息，生活依然艱苦，手停口停呀。

在一些農村裏，筆者還碰到過一些年輕人，他們出去之後就不再願意回村裏了，就算回來，也是帶著外人的眼光來看自己的地方。他們對農村的評價是：「又髒又臭，怎麼能住人啊，太不習慣了」；「村裏人就是沒知識，有了錢也不搞搞衛生」；「拜祖宗這種迷信的東西我不搞的。村裏人太迷信了」……

對自己社會的嘲弄，接受別人賦予自己的身份標籤來否定自己的身份，聽起是多麼的諷刺和令人心酸。但，這可是基於城鄉長期的不平等，基於主流社會對農民／農民社會的負面建構啊。

結語

結語之時，我想起前年在貴州山區做口述歷史時的一個片段。

一個晚上，坐在昏暗的燈前，與某村寨一位年輕人小李促膝談心。他今年二十歲左右，剛剛從城裏師範學校畢業回來。曾幾何時，師範畢業對於山區多少的村民來說是多麼令人羨慕的夢想。然而，在小李的眼中，我似乎看不到太多的興奮。小李告訴我，今年開始國家的政策改變了，所有師範畢業的學生已經不獲分配。「不分配」對於山區的人來講是一個噩耗，意味了地／他們失

去了一個離開山區的機會、失去領國家工資的機會、失去了改變身分的機會……失去的太多了。

一直以來「城」和「鄉」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身份。持城市戶口的居民享受著國家提供種種的福利和優待，例如固定的工資、基本的福利、基本的物資配給等；相反，農村在國家強調發展城市和工業的策略下，農產品被國家低價地收購以補助城市居民，統購統銷的政策犧牲了農民的利益。持農村戶口的農民享受不到國家的照顧，他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農民一直生活在飢餓的邊緣。在農民的心目中，城市戶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寶貝，因為它代表了身分、代表了物質享受，每個農村的人都渴望能改變自己的戶口和身份。

農民要改變自己戶口的門是非常窄的，通常只有三個——考大學、參軍、通過城市招工。改革開放前，教育對農村子弟來講是多麼的重要，除了學到知識之外，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通過考上城市的大學，他／她們有機會改變自己的戶籍。大學畢業，通過國家的分配，他／她們可以變成吃國家口糧的幹部和人員，一定程度上從此衣食無憂。多少農村學子挑燈夜讀、含辛茹苦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夠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民轉為城裏人。這條路實在不是一條易路，一開始他／她們就已經面對著結構上的不平等。農村在教育上的資源一直缺乏，師資一直不足，能考上的實屬少數。改革開放後，國家相對的放寬了農村人口流動的限制，然而要改變農村戶口還是相當困難，要麼花一大筆的錢去買一個城鎮戶口，要麼去拉關係、走後門，對貧困山區的農民來講，談何容易。

另外，雖然改革為中國一些農民帶來不少就業和改善生活的機會，但這些機會卻不是每個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山區)的農民所能享受的，他／她們依然生活艱苦，田裡幹活依然是她們糊口的主要手段。在這種情形底下，能夠考上大專院校依然是山區很多年輕人的夢想，這夢想意味著他／她們有一天由國家分配工作、享受固定的工資，不需再從事著骯髒和辛苦的體力勞動。國家政策的改變，對於希望透過教育的途徑改變自己的農民身份和生活的山區人民來講無疑是一種打擊，努力讀書的結果還是要呆在山區。在農村的訪談中，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年輕人對學習失去了動力，聽到了一些「讀書無用」的講法。

「到城市打工」似乎變成農民離開農村的唯一途徑，也變成了他們的新夢，然而「到城裏打工」、「賺更多的錢」是一種迷思(myth)，還是

一種事實(reality)呢？當他們在圓夢的時候，他們再一次淪為城鎮的邊緣群體，他／她們除了在工作的場域受到剝削之外(眾多海外和國內學者對他們的生活處境已有詳細的研究，例如Chan 1996; Pun 1999; Rolal 1992; 譚深1998; 杜鷹等1997等)，也同樣受到城鎮居民的歧視和偏見。在城市人眼中外來人口(農民工)是骯髒、貧窮、落後、不文明和愚昧的，而且是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源(例如：暴力、犯罪、居住環境的破壞等)；他們同時被看成是影響本地人的資源分配和就業機會的「不歡迎人群」。這裏我想要指出的是他們淪為城鎮的邊緣群體是由於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群體的制度性歧視以及對農民社會負面型的建構。今天在中國社會社會排斥最主要的問題並不是種族(race)問題，卻是城鄉的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和改革時期國家對農民社會和農民群體的負面建構都是為了肯定國家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政策的合法性。在這種發展主義文化的不斷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中，大部份中國農民也接受了別人為他們建構的形象，自我否定、自我矮化。今天當我們不斷在提倡扶貧減貧、農村發展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去反省發展主義的論述，重新肯定農民社會和其文化，讓農民群體尋回自己的價值和能力的話，一切發展的結果只是再度否定農民社會，強化農民的邊緣性。

參考文獻

- 馬克思。197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1。《毛澤東選集：第一集至第四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譚深。1998。〈打工妹的內部話題〉。《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63—73。
- 杜鷹等。1997。〈四川、安徽農民訪談錄30則〉。《走出鄉村》。頁271—348。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解放日報》。1942年2月21日。
- Adas, Michael. 1992. "From Avoidance to Confrontation: Peasant Protest in Precolonial and Colonial South Asia."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anuri, T. 1990.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Role of Modernization." Pp. 249-78 in

-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Stephen A. Margl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han, A. 1996. "Boot Camp at the Shoe Fac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 Cheng, Tie 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644-68.
- Cohen, Myron L. 1993.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Peasa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22(2):151-70.
- Collins, Randall. 1994. *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Selected Rea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8. "Power and Visibi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In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Third World."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428-43.
- Fanon, F. 1987. "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of Our Time." In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Selected Readings*, edited by Teodor Shani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_____. 1981.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 _____.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
- Frow, J. 1985. "Power and Discourse." *Economy and Society* 14(2):193-214.
- Giddens, A.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rky, M. 1987. "The Barbarians." In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Selected Readings*, edited by Teodor Shani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Guang, Lei 2001. "Reconstituting the Rural-Urban Divide: Peasant 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Orderly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8):471-93.
- Gupta, Akhil. 1998.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s: 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obart, Mark. 1993.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 Growth of Ignorance*. London: Routledge.
- Huang, S. M. 1994. *The Spiral Road: Changing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Lardy, Nicholas, 1987. *Agricultural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dden, David. 1992. "India's Development Regime" Pp. 247-287. i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edited by Nicholas N. Dirk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arx, K. 1987. "Peasantry as a Class." Pp.331-39 in *Peasant and Peasant Societies*, edited by T. Shanin.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Muegler, E. 1991. "Money, the Mountain and State Power in a Naxi Village." *Modern China* 17(2):188-226.
- Pun, N. 1999. "Becoming Dage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2:1-18.
- Rabinow, Paul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London: Penguin.
- Rawski, E. S. 1972.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fel, L. 1992. "Rethinking Modernity: Space and Factory Discipline in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7(1):93-114.
- Said, E. 1979.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 Schurmann, F.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9.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Pp. 3-33 in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edited by F. D. Colburn. New York: M. E. Sharpe.
- Shanin, T. 1987. *Peasant and Peasant Societ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Vogel, E. F. 1965.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 Yan, Y. X. 1996.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Mayfair.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註釋

- 1 像Escobar (1998) 所言，專業的建立是指一套以組織、管理和控制知識的產生、擴散和確立的技術和規制實踐 (disciplinary practices)，也就是創造和維持一套真理政治 (politics of truth) 的過程。
- 2 在「發展」的旗幟之下，許多跨國公司到第三世界建立工業，美其名是幫助這些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實質是為了當地的市場、廉價勞工和資源。第三世界的政府極力希望脫離貧窮，故與外國資本一拍即合、大力發展本國工業或農業現代化。這種發展的形式無疑在製造剝削的關係，亦使這些被發展的國家在經濟上依賴發達國家，不但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問題未能解決，更加深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社區公共服務社：消除邊緣性的社會政策研究與應用

楊國、葛道順

背景及現行政策評價

一 去工業化和單位制解體導致下崗失業人數增加、邊緣群體規模擴大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九十年代更為強勁的全球性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 趨勢的影響下，中國城市特別是老工業城市的經濟結構，在九十年代發生重大轉變，加上日趨深入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國有國營企業朝向股份制和私人企業等更市場化的組織形態，傳統的單位制日趨解體。這兩股壓力導致了自1996年以來，大批產業工人下崗失業，成了中國二十世紀末的一種持續性潮流。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年報》，1998和1999年城鎮下崗人數分別為892萬人及937萬人，這兩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和3.2%，失業人員約為571萬人和600萬人，下崗和失業人員兩部份之總和約為1,463萬人和1,537萬人。2000年僅上半年，下崗人數就高達677萬人，加上失業人員，總和超過1,600萬人。這還未計算城鎮企業中，停產、半停產或破產企業的待崗職工，與進城農民工中的失業人員。據國家計委楊宜勇先生的估計，全國的待崗職工大約有1,600多萬人，其中有部份與下崗失業人員重複統計，故最保守估計起碼有30%的人員(即約有500至600萬人)未進入統計範圍(楊宜勇2001)。本文認為，有2,200萬人屬於下崗、待崗和失業人口，失業率當在11%左右。

去工業化意味著勞動力市場將長期面臨供大於求的局面，從而使城市的下崗失業成為一種長期的顯性社會現象。它導致原有的社會結構及社會意識發生斷裂，使社會衝突加劇。顯然，這對於建築於工業化社會基礎之上的二十世紀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它不但直接關係著下崗失業者能否得到及時、足夠的生活保障，而且透過這批人在社會影響的放大效應，直接威脅著整個社會心態和社會大環境的平衡。

據有關研究揭示，中國現階段由去工業化和社會轉型所導致的結